抗战初期的浙江国共和谈

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七七事变前后，先后两次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进行合作抗日的和平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标志着浙江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

1935 年 2 月，奉中央指示，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军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进入浙江活动。同年 10 月，刘英、粟裕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举行联席会议，会后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成为党在南方 8 省 14 个革命战略支点之一。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停止对主力红军的进攻，但仍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对我南方各游击区的“围剿”。同年底，任命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主任，调集 6 个师，2 个独立旅，以及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向浙南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达 8 个月的“围剿”。我军在战斗异常残酷的情况下，把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持下来。

当年闽浙边临时省委虽然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但不断搜集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分析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从上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版的、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大众生活》等所透露的消息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并以这些材料为内容，在党内与部队中进行教育，使之对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宣传我党抗日救亡主张。如得知 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时，临时省委即发表《快邮代电》表示支持;1936 年 6 月发生两广事变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1936 年 9 月以后,省委主动对具体政策作了调整,如将“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将“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的口号，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把用“打土豪”的办法筹款,改为征收“抗日捐”。并注意团结进步士绅和商人。同时,还将红军挺进师的番号改为“闽浙人民抗日红军”。这样,为国共和谈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了充分的政治、思想条件。

（二）

1936 年 7 月，浙南地下党与上海地下党及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取得了联系。1937 年 3 月,由浙南地下党派往上海学习的吴毓回到温州，上海地下党交他带回当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送交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刘英当时在浙南的平阳北港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由于敌人层层设卡封锁,吴毓无法找到刘英,折回温州,与在温州的黄先河和黄耕夫、周饮冰等研究。他们根据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决定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触,进行试探。他们以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的名义拟了一份《快邮代电》,于 3 月 25 日分头从永嘉、乐清、瑞安、上海等地投邮,发给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

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温州、处州、衢州行政监察专员公署及有关县党部、县政府等。其主要内容是：呼吁国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双方保证谈判代表的生命安全；并提出平阳北港人士林奎、温宗周为双方联系人，约定会谈地点；建议对方登报答复我们。《快邮代电》发出以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连续在《东南日报》、《浙瓯日报》上制造舆论，把我党为挽救国家民族严重危机而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诬蔑为“投诚”，另一方面，派出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政训处长邓讱和浙南驻军十九师旅长唐伯寅来到温州、平阳进行所谓“收编”活动。4 月 30 日，《浙瓯日报》刊登了署名林奎、温宗周的《紧要启事》，暗示要我方派人与之联系。

《紧要启事》见报后，吴毓与黄先河从温州经瑞安在平阳腾蛟包垟找到刘英，汇报了以上情况。为此，刘英在大屯村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会议“估计这次谈判很少实现的可能，其原因：A、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政策的转变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B、根据当时的局势与实际地理环境，还有延长局部内战的可能；C、他们在军事上占了极大的优势”。但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独立与批判的自由和红军武装保持独立性这两个原则为退让最低限度”。会议决定我方条件基本上援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所提出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以吴毓、陈铁军、董启文为我方谈判代表。

吴毓到了温州城，在新聚顺旅馆单独与林奎见了面。为了安全，吴毓带林奎到市区边沿的三育小学教师张达生处密谈。林奎自称是受十九师旅长唐伯寅的委托而来的，转达了对方表示愿意和谈的意思，并说谈判代表的安全不会有问题。第二天林奎陪同吴毓与唐伯寅、邓讱见了面。吴毓以省委联络员的身份提出，如果对方有谈判诚意，建议停战 1 个星期，以便进入根据地向组织汇报。当

日中午，邓讱在五马街醒春居酒楼宴请吴毓，十九师师长李觉、温州专员许蟠云以及唐伯寅等作陪。宴会后，双方初步交换了意见，对方同意先行停战，并以邓讱为正式代表进行谈判。

会谈于 5 月在平阳山门和温州城举行，开始时，双方交换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看法，我方代表着重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深重,非团结不足以救亡,非抗战无以图存。对方表示愿意和谈。次日，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我方首先提出了：

一、闽浙抗日红军愿意改为国民革命军，根据国军的编制，直属南京军事委员会指导；

二、闽浙边区改为特区，在特区内实行民主选举，行政上按照国民政府的系统，国民党可以派代表或顾问参加；

三、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四、停止没收地主的财产，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后的一切给养，由国家财政拨补；

五、闽浙红军改编以后,在特区内集中训练,准备对日作战。

同时,提出 5 点要求：

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

二、召集各党派各武装部队代表商讨救亡大计；

三、开放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

四、释放政治犯；

五、改善人民生活。

对我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国民党代表立即反对。他们提出早已准备好的 4 条：

一、闽浙红军接受改编，待遇与国军相同；

二、取消苏维埃赤化宣传，并停止赤化活动；

三、闽浙红军应随时听候调遣与指挥；

四、闽浙红军中的政治人员一律到南京受训后分发。

显而易见，国民党代表妄想在谈判桌上达到他们在战场上

没有达到的消灭我党我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因此，我方代表严词加以拒绝，谈判陷于僵局。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方提出闽浙抗日红军认为在国难当头的今天，不忍内战的再续，情愿舍弃一切，集中开赴抗日前线，要求对方保证行军路途的安全。对方代表表示要向上级请示。在谈判进行期间，国民党继续调动兵力，封锁交通要道，作好“围剿”我根据地的准备。5月18日，国民党公然以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参谋长的名义宣布，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即“停抚痛剿”“灭绝根诛”。后来，谈判地点转平阳鳌江。国民党代表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和平谈判完全破裂。5月22日，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这以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

和谈破裂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先后发表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和《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揭露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肆意破坏和谈的罪责。同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及时向党中央写了和平谈判破裂情况的报告，经上海地下党转送延安。

（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7月8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即发出通告与宣言，再次敦促蒋介石、刘建绪“国难已到了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应无条件的首先停止内战”。这时候，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党中央还以贺龙名义写信给刘建绪，晓以民族大义，敦促他与红军共同抗日。这样，促使刘建绪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党的和谈建议。

8月下旬，刘建绪将6月上旬青田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的、原我方谈判代表陈铁军从衢州监狱中释放出来，并让他带回贺龙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刘建绪的信以及刘建绪给关英、黄道、刘英的信，同意重开和谈。陈铁军在瑞安五云山根据地找到刘英，汇报了情况。省委决定由吴毓、黄耕夫为我方代表8月24日，与刘建绪的代表邓讱在温州申江旅馆进行第二次谈判。达成以下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

一、闽浙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按照国军的编制，待遇与国军相同；

二、闽浙红军在瑞、平、泰三县边界以峰门(在泰顺县境内)为中心集中，集中期限为半个月；

三、红军集中时，如遇国军与地方部队攻击，由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负责。如红军发生暴动，则由闽浙边省委负责；

四、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五、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会谈结束后，对方将关押在永嘉监狱内的张忍之、陈急冲、邓扫空等释放。此后，被关押在衢州、瑞安和平阳等地国民党监狱中的我方人员也陆续出狱。

8月27日，我方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要求我各部队迅速集中，以期早日实现对日直接作战；注意团结所在各地区的国民党驻军及一切地方武装部队，保护碉堡、电线和各种交通工具。但国民党方面没有及时将和谈的结果通知各县、各军，致使红军的行动仍然发生困难，未能在商定的期限内集中。

9月16日，邓讱派了政训处上校处员王裕光、中校处员詹行烈到平阳山门，会见了刘英，双方作了进一步会谈。因为情况变化，商定红军集中地点改为平阳北港区，集中期限延到10月1日；将原协议“根据国军编制”改为“根据任务编制”，加上“目前宣传工作，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原则进行”这一条。关于今后部队调动问题，刘英表示必须请示我党中央才能决定；王、詹等同意留待以后进一步解决。

在谈判中，从国民党代表处获悉我党已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

事处。闽浙边临时省委即派龙跃、吴毓与王裕光、詹行烈同到杭州向刘建绪作礼节性的回访，然后到南京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谈判经过和请示工作。在杭州时，刘建绪节外生枝，提出要将闽浙红军改编为他的第十集团军的一部（他取个番号叫第一路抗日游击队），开到乍浦一带驻防。龙、吴重申我们的部队行动必须请示党中央，仅表示将他这一意见向省委汇报。

龙、吴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秦邦宪，汇报了情况。秦邦宪指示，部队集中后不要下山，防止国民党军队阴谋袭击。并说，周恩来正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谈判，拟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他规定：在新四军组成之前，没有他的亲笔信，任何人不能调动部队，并将上述情况给刘英写了亲笔信，信中转述了党中央 8 月 1 日《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龙、吴回来时经过杭州，再去见了刘建绪，把国共两党中央谈判组成新四军的消息告诉他，说明我们的部队将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我军仍继续在原地集中训练。刘建绪不再坚持要我军开赴乍浦的意见。

在温州国共双方和平谈判的同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另一领导人粟裕正在浙西南遂昌门阵一带活动。他仔细分析了从金、衢不断传来的各种传说，认为有可能是国共再次合作，便派刘亨云带了一支小部队化装为国民党军队，下山收集情况。经证实国共双方已再次合作，就给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发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10 月 14 日国民党遂昌县长林树艺派军事科长朱镇山等人为代表，到门阵与我方代表谢文清、刘清扬进行谈判。对方请我们下山进城，我方提出：一、我们将开赴浙南地区整训，沿途不得留难；二、我们已停止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三、双方是平等合作，我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进城。对方同意我们的意见，达成了协议。粟裕便率领部队开赴平阳北港，与刘英会合。

综上所述，先后两次和平谈判，是在国民党 8个月‘围剿’的严

酷环境中，闽浙边临时省委主动争取、坚持下进行的。由于全国的形势发展和党中央政策的正确，以及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和平谈判和贯彻协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在统一战线政策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权，省委机关和部队一直没有离开原根据地，使国民党在谈判桌上和在战场上，都无隙可乘，保证了谈判的顺利进行。

（四）

1937 年 10 月，挺进师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在平阳北港山门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由粟裕任队长，刘英任政委。随后临时省委在山门大屯举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在山门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作战训练和政治工作，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12 月 1 日，根据和平协议，我党在温州设立了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主任吴毓。

1938 年 3 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山门，传达上级指示，决定由粟裕率领抗日游击总队及抗日救亡干校部分学员组成的随军服务团，共 400 多人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3 月 18 日自山门出发，开赴皖南，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由于浙江的战略地位重要，原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决定刘英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

3 月，刘英与曾山一起去南昌向东南分局汇报工作，在金华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进行一次会谈。会谈结果，黄绍竑同意：一、发给我军子弹 5 万发，军衣 1000 套；二、我党在浙南地区设立 3 个办事机构，即在温州城内九柏园头设立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在平阳北港水头街设立新四军闽浙边留守处，主任黄耕夫；在丽水高井巷设立新四军浙江办事处，主任吴毓。

1937年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谈判的成功，既保证了我红军挺进师部队顺利地完成集中、改编和开赴前线的任务，又保存了原浙南游击根据地，开创了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原载《光辉的历程》）

浙江红军的改编和北上抗日

包 晓 峰

1935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利后，闽浙赣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摧残。当地红军在闽浙赣省委的领导下，在皖浙赣边分散进行游击斗争。从怀玉山突围的部队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领导下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支援了兄弟地区游击斗争的开展，给国民党后方以严重威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皖浙赣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挺进师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分别奉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于 1938 年 2 月和 3 月先后赴皖南加入新四军的行列。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迫使国民党对内战的态度逐渐改变。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于 1936 年 8 月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1937 年 4 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省军区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挺进师谈判，5 月，双方在平阳鳌江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破裂。七七事变爆发后，刘建绪给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与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重开谈判。8 月，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达成停战抗日的协议。8 月 27 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签署

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要求所属'各部迅速向军区集中,以期早日实现对日直接作战。[1]'闽浙边临时省委另一位领导人粟裕于 10 月 14 日与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进行谈判,达成停战协议。随即,粟裕率部前往平阳,与刘英会合。

为了向上级汇报浙江国共两党和谈的经过,请示浙江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及部队的行动,闽浙边临时省委派吴毓、龙跃赴南京八路军办事处,9 月 29 日,吴毓、龙跃到达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党中央代表秦邦宪(博古)作了详细的汇报。博古告诉吴毓、龙跃: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将由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谈判,准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拟请叶挺出来担任军长。博古同志还要吴、龙转告刘英同志,部队集中后,不要下山,或者住在山边,以防止国民党阴谋袭击。在新四军组成之前,没有博古的亲笔信,部队不能调动。10 月初,吴毓、龙跃同志离开南京回到浙南,并带回博古给刘英的信,信中除把以上情况告知刘英外,还向刘英传达了党中央 8 月 1 日《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对国民党的任何挑衅和进攻,必须坚决进行自卫。在达成停战协议后,应大力进行训练,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保持过去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2]

关于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我党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10 月 2 日,我党代表博古、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皖、浙、鄂、豫 8 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予以公布,并任命叶挺为军长。鉴于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已无大的根据地,大多数部队极分散,一集结则给养无法解决,继续分散则消耗力量,10 月 8 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向中共中央提出南方游击队向皖南集中。关于新四军的编制问题，经叶挺与国民党军委会交涉，核定“：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 4 个游击支队，所请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游击队司令 ’。[9]

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派人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的同时，抓紧进行挺进师及地方武装的集中工作，并确定平阳北港作为部队的汇集地点。到 1937 年 10月中旬集中完毕。由于经历了 1936 年 11 月到 1937 年 7 月的 8 个月艰苦的反‘ 围剿 ’斗争，挺进师从 2800 余人减员到 300 余人。挺进师刚进浙时的老骨干已不多，但补充了许多新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这支部队装备虽然不好，但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

部队集中以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凤卧乡凤林村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将部队番号改为 “ 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 ”，下辖 4 个中队，后来扩招新战士又成立一个新兵队，共 5 个中队。会上，刘英、粟裕同志都讲了话，说明国共合作和部队改变番号的意义，号召大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由于在部队中反复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教育，部队改变番号比较顺利。

部队集中后的首要任务是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提高指战员的素质，以适应已经到来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因此，从部队集中到出发抗日的这段时间，除了加紧练兵外，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抗日游击总队部开办了 3 期军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 20 余人，以军事干部为主，为期 10 天 第二期学员 15 人，是浙西南、浙东南的地方干部，为期半个月；第三期学员约 18 人，是浙南干部，为期半个月。这 3 期学员，军队是连级以上，地方的是县级以上。所有课程都是刘英、粟裕亲自讲授，主要讲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

独立性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经过干训班学习的同志,政治、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考虑到将来斗争中干部严重不足的问题,闽浙边临时省委还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名义于 1938 年 1 月初到 3 月中旬在平阳山门开办了抗日救亡军政干部学校,学员大部分是温州各中学的学生,还有从处州、台州和上海等地来的大、中学生,共 200 多人。校长由粟裕兼任,黄先河为副校长,黄耕夫为教育长。学校设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刘英同志也经常到学校讲课。学员的学习情绪很高,除了听课和军事训练外,还经常到附近农村做群众工作。

1938 年初,新四军军部两次来电报摧调“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去皖南集中。但由于 1937 年 9 月底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博古曾亲自交待吴毓、龙跃,并写信给刘英,没有博古的亲笔信,部队不能调动,而这时候八路军办事处和博古并没有来信。为了弄清原委,2 月中旬,刘英派龙跃、余龙贵同志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部队的行动。龙、余途经南昌时找到了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得知新四军军部就在南昌,经办事处的介绍,龙跃、余龙贵见到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项英得知龙、余是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派来联系工作时,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项英还对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在浙江的游击斗争和党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龙、余向项英同志扼要地汇报了浙江国共和谈、红军挺进师集中训练和浙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等情况,还谈到准备到武汉找博古的打算。此时项英刚好要去武汉参加长江局的会议,刘英给博古的信由项英带到武汉。10 余天后,项英从武汉回到南昌,告知龙跃、余龙贵:“浙江部队的编制、集中地点以及今后浙江工作安排,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统一了意见,作了专门决定。东南分局决定派组织部长曾山同志跟你们一道去浙南,向刘英、粟裕同志传达。”

1938 年 3 月初,曾山由龙跃、余龙贵的陪同到达浙南平阳山门。曾山到达时，刘英、粟裕率领全体指战员和救亡干校的全体师生，排列在山门街外的道路两旁，吹军号、放鞭炮，夹道欢迎。曾山向刘英、粟裕介绍了当时的抗战局势，传达了党中央对南方游击根据地的指示，说明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对原挺进师及浙江党的工作曾山传达了东南分局的指示：一、浙江红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集中地点为皖南泾县章家渡，部队应及早出发；二、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南继续坚持；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转为正式省委，原闽浙边临时省委两位主要领导一个带队去前方,一个留下继续领导浙江工作。经刘、粟交换意见，确定粟裕去前方，刘英同志仍留在浙江工作。曾山在山门期间还应邀给抗日救亡军政干校学员作了目前形势和苏联见闻的报告。

为了向东南分局请示今后浙江党的工作，1938 年 3 月上旬，刘英随曾山一道去南昌。刘英同志考虑到今后浙江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为部队出发抗日尽可能地争取到国民党的一些资助，途经金华时，拜访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刘英除告诉黄原挺进师即将开赴皖南集中外，还向他提出如下建议和要求：

一、为了照顾部队家属和处理今后我党我军在浙江的有关事宜，以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事业，建议在平阳设立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在温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在丽水设立新四军办事处；

二、由于我军过去一直处在艰苦的环境中，物质条件很差，现在要开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斗，要求省政府发给我军步枪 500 支,子弹 10 万发,军服 1000 套。

此外，刘英还把吴毓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介绍给黄绍竑，以便工作上的联系。对刘英的意见，黄绍竑同意第一点，并答应发给挺进师5万发子弹，1000套军衣。

3月18日，经过紧张的准备，粟裕率领“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500余人由平阳山门出发开赴皖南。这天，当地群众和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组织代表，站立在山门街的两侧，唱着歌、呼着口号，敲锣打鼓欢送指战员。部队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派人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大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的迎送，这时的政治形势充满着抗战的气氛，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的人民群众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途经云和大港头时，黄绍竑专程从金华赶到丽水碧湖会见粟裕，再由粟裕陪同到大港头检阅我军，基本上实现了他和刘英同志会谈时许下的诺言，发给我军部分军衣和子弹。在大港头，双方还举行了大会。粟裕首先讲话，他说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久远的历史上，凡是团结、统一的，都能有效地抵御外侮。今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濒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共联合团结抗日，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我们要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日，为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为增进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大团结，为驱逐日寇、光复中华而奋斗。黄绍竑在讲话中再三地向我军表示慰勉，预祝我军到抗日前线后旗开得胜，为国家为黎民多立战功。部队经过遂昌时，我军召开了各党派、各阶层座谈会，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参加座谈的各阶层人士表示欢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认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出路。当晚，挺进师还在遂昌王家祠堂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当我军进

入会场时，全城的群众争先恐后犹如潮水般涌到会场。威武的指战员齐声唱起了《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保卫大浙江》等歌,群众队伍也唱起了《欢迎抗日的新四军》、《军民合作,抗战到底》,情绪十分高涨。粟裕作了热情的讲话，向挺进师在浙西南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给予大力支持的遂昌人民表示感谢，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粟裕同志还为释放政治犯问题给遂昌县长写了信，指出“当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尚有共党及共党嫌疑犯仍禁锢囹圄，诚令人不得其解！……谅能查明案情,即日开释所有政治犯，俾便参加救亡，民族前途实利赖之。”[4]并附了‘政治犯’的名单,结果,关押在遂昌的‘政治犯’全部获得释放。

部队经过近 1 个月的行军,顺利到达安徽歙县岩寺。根据新四军军部决定，“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整编为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同志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在皖浙赣地区，经过红军的英勇奋战，分别建立了贵（池）秋（浦）东（流）、鄣公山、泾（县）旌（德）宁（国）宣（城）、开（化）婺（源）休（宁）4 个游击根据地。1936 年 4 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在鄣公山召开会议，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仍由关英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赣东北、皖赣、浙皖、上浙皖、下浙皖 5 个特委,并把各路红军 800 余人统一编为皖浙赣独立团。巩固与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游击根据地。

1937 年 2 月，由于国民党派重兵对皖浙赣根据地实行“清剿”，皖浙赣省委和独立团在浙西的淳安、遂安遭敌袭击，损失惨重，省委书记关英与部队失去联系转玉山隐蔽，独立团政委刘毓标负伤被俘,仅团长熊刚带 20 余人突出重围。除皖赣特委外,其余特委也都遭到严重破坏。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被迫派人与皖浙赣党组织进行谈判。中共皖赣特委决定乘此机会派人寻找上级党组织,渴望得到中央的指示。时新四军办事处已在南昌成立。陈毅、项英给

皖浙赣党组织送来“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皖赣特委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告皖赣同胞书”。11 月,皖赣特委派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江向对方提出谈判条件应由中央统一决定,在未得中央统一规定前,要求对方履行下列条件:

1 准许我方人员通行无阻,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

2 停止向我进攻,撤退根据地周围驻军,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恢复群众生产自由;

3 释放一切政治犯;

4 我方不打土豪,但对方负责解决部队的供给。

不久,皖赣特委又派李步新、江天辉去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情况,请示部队今后的行动。12 月,陈毅亲自到皖南祁门舍会山,在皖浙赣党的干部会上,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同时,要求皖浙赣地区的红军迅速集中整编,加强政治教育。1938 年 1 月,皖浙赣各路红军 300 余人在舍会山会合,随之部队开到浮梁瑶里整编。陈毅再次从南昌到瑶里,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共有 500 余人。2 月,部队在瑶里召开誓师大会,随即开赴皖南岩寺集中,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三营。

对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央政治局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专门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认为红军游击队“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交与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宝贵的胜利。”[9]这一评价对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挺进师和皖浙赣红军来说,都是恰如其分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